

摇摇图书在版编目(悦孕)数据

中国书写 :当代知识分子写作与现代性研究 轲言宏著 鄢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缘园缘缘

陈丹 苑 康 苑 缘 苑 缘 苑

I 鄢中...

II 鄢何...

III 鄢当代文学-文学创作-研究-中国

IV 鄢陈源

中国版本图书馆 悦孕数据核字(圆园园园)第 圆 苑 苑 苑 号

中国书写

何言宏摇著

出版发行 :中央编译出版社

地摇摇址 北京西单西斜街 猿远号(苑园园缘)

电摇摇话 远缘园园园园 远缘园园园园 编辑部) 远缘园园园园 发行部)

耘皂 葬蚤造 藻皂 耘皂 耘皂 耘皂 耘皂 耘皂

澡 贼 贼 责 : 耘曾 曾 耘曾 耘曾 耘曾 耘曾

经摇摇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摇摇刷 :

开摇摇本 愿园伊愿毫米 摇员 摇圆

字摇摇数 圆源千字

印摇摇张 怨 缘

版摇摇次 圆园园园年 缘月第 员版第 员次印刷

定摇摇价 员圆 苑 元

目摇录

序

员

第一章摇引摇论

员①

第一节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圆

第二节摇文化领导权的现代性本质与基本形态

缘

第三节摇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谱系

愿

第四节摇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制度体系

圆

第五节摇“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历史起源

远

第二章摇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与话语规范的确立

圆

第一节摇文学领域的制度安排

缘

第二节摇同质话语的激励机制

苑

第三节摇异质话语的规约机制

愿

第三章摇“新时期”文学知识分子现代认同的历史起源

苑

第一节摇意识形态、历史转型与身份认同

苑

第二节摇“革命认同”：“右派作家”的历史宿命

圆

第三节摇“人民认同”：民粹主义的内在悖论	员愿
第四节摇“知青认同”：历史身份的突显与遮蔽	员园
第五节摇“启蒙认同”：知识分子的身份自觉	员员
第四章摇“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员)	员苑
第一节摇“反‘左’”话语：新的现代性话语体系及其基本困难	员愿
第二节摇“反封建”话语：五四”话语的接续与新变	员缘
第五章摇“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现代性话语的历史起源(圆)	员苑
第一节摇“人道伦理”的历史重建	员园
第二节摇“人道话语”的政治关切	员苑
第三节摇话语突围与历史限禁	员愿
第六章摇现代性叙事的历史性重构	员源
第一节摇叙事模式与意识形态	员缘
第二节摇“旧小说”及民间叙事模式的现代性转换	员苑
第三节摇“现代性叙事传统”的历史性“翻版”	圆员
第四节摇“结尾”的意识形态：希望原理	圆苑
第七章摇“工具文体”的早期突破	圆愿
第一节摇“工具文体”·“精英文体”与“精英主体”	圆园
第二节摇“精英结构”的重组	圆员
第三节摇“精英语言”的出场	圆员

序

丁摇帆

摇摇从九十年代起,何言宏就执着于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尤其是热衷于对意大利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思想阐释。因此,当他做博士论文时,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这一理论作为支点,对“新时期”以来的各种文学与文化现象进行了十分透彻的厘定和实证性的研究分析。

“文化领导权”作为一个世界性的文化母题,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社会主义社会,都是一个无法回避的理论与现实问题,而对共和国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文化话语的研究,尤其是对“新时期”以来纷繁复杂千变万化的话语权力的研究,几乎就是我们目前文学和文化领域中的一个研究盲点,就此而言,何言宏的这个选题就具有了极高的学术价值。

“新时期”以来,我们的理论研究之所以取得了共和国建国以来最为辉煌的成就,就是依赖于一个理论开放的时代,因此,作为新一代学者,何言宏十分幸运的是,他无需去考虑什么“理论胆识”及“理论勇气”的问题,而只需去考虑怎么样合理地运用先进的理论,去实证性地研究中国的文学与文化所面临的许许多多问题。因此,他便可从一个十分客观的、中性的、历史和美学的科学视角,来从容平静地审视“新时期”以来文化话语的

每一个细小的环节以及它的每一次裂变。

作为一项科学而严密的实证性研究,何言宏深深地懂得,其理论体系的构建与完善,并不止于对他人理论的移植与运用,而是首先要依靠自身对于历史和文本的熟悉程度,依靠自身对于各种中外文学和理论的知识积累,依靠自身在历史、文本和理论间爬梳比较的功力与识见。就此而言,何言宏以他十二分的勤奋和刻苦,以及他那不可多得的敏悟能力,十分漂亮地完成了这一次理论的证明,在此意义上,他也算是进行了一次艰苦的精神长旅。

强烈的理论色彩与严谨的实证研究相辅相成,成为这一部理论专著的显著特征。由此,我联想到近二十年来的理论研究状况: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泡沫学术出现?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理论抄袭现象?完全归咎于一个浮躁的物欲时代也是不公平的,从主观上来说,我甚至认为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对于科学的实证主义研究方法的舍弃。何言宏选择了这个看似十分简单却又异常艰辛的理论实践之路,却是个大智若愚的精明之举。通过一次次不厌其详的实证演绎,甚至用一幅幅图表明示出精确的数据,论者所要阐释的理论就十分牢靠地屹立在强大的实证基础上了。其实,这是一个治学的常识问题,但是在这个充满着物质性和功利性的时代里,所缺少的恰恰就是这样一个须得花费气力的治学态度。比起许多花哨的博士论文来,何言宏这种扎实的学风取向尤其显得难能可贵。

在我们这个浮华的物欲时代里,坚守一种知识分子的立场和姿态是很不容易的,从“革命认同”、“人民认同”、“知青认同”及“启蒙认同”的多项选择中,是否需要一个较为恒定的价值立场呢?这是一个时代的文化死症的命题。“是生存还是死亡?”在此问题上,如今的许多知识分子都在彷徨。“精英主

体”和“精英文体”是否必要？它们能否存活下去？对于这些，何言宏均都作出了令人信服的准确回答。

在现实生活中，何言宏是一个十分随和的人，但是，他在学问上，却不愿意有一丝一毫的放松。这些年来，他在学术上的进展是有目共睹的，也算是一个小有名气的年轻学者了，现在，他又正在独立主持一项国家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可谓是“春风得意马蹄疾”！这些成就的取得，都得益于他的勤勉与刻苦。自从北京大学中文系硕士毕业以后，他一直没有放弃过学业的追求。在南京大学攻读了博士学位以后，他仍然不放弃学术环境的营造，继续到复旦大学去从事博士后研究。我劝他不必再花那么多的精力去来回奔波了，何况他在南京师大文学院的课务负担还很重。后来我才知道，他是想在几种学术环境的比较中，汲取更多的学术营养，以便做出更为扎实的学问来。

我祝愿何言宏做出更为扎实的学问来！有这部煌煌论著作为铺垫，我相信，他在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一定会有更加重要的学术创获。

是为序。

二〇〇四年 猿月 怨日于紫金山下

第一章

引摇论

“新时期”以后中国的文学与文化实践迫切需要进行整体性的重新研究,这种研究,既需要开阔的理论视野,也要求一定的学术创新。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也许能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一种恰当而又有力的支持。为了使我们的尝试性研究不致空泛而具有一个较为扎实的起点,我们选择了“伤痕”、“反思”小说这样一种个案。之所以进行这样的选择,更因为“伤痕”、“反思”小说正是“新时期”知识分子写作的历史性起源,它所处身其中的文化领导权,也在 1978 年以后的中国历史中拥有着“承前启后”的转型性特点。研究“伤痕”、“反思”小说与其所处身的文化领导权,研究二者间的复杂关系,对于研究“新时期”整个的知识分子写作以及 1978 年、特别是 1982 年以后的文化领导权,均都具有重要的“原型”意义。

目前,中国的思想文化界对于 20 世纪中国文学与文化的研究,已经具有了相当开阔的理论视野和极为丰富的研究方法,这

些理论视野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吸纳,大都导因于近些年来西方文化思潮对于中国本土的涌入以及社会情势的变化所导致的知识者政治文化心态的调整,在这之中,意大利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安东尼·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1]理论也被一些学者所注意并以此作为“文化研究”的新的理论之维。但是,应该指出的是,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在当下中国的命运正如其在西方一样,其“革命核心”被置换、重写、解构、遮蔽,而该理论中的重文化精神因素、反系统性、反整体性的倾向,则被大大扩展、延伸和利用^[2],这种“理论偏倚”,相当突出地表现于关于“第三世界文化”和“后殖民主义”的文化讨论之中。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曾经探讨过现代以来“西方文化对于整个世界文化的霸权^[3]”问题,而这一问题,则正是一些“后学”论者所耿耿于怀并着力批评的^[4]。实际上,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革命核心”因为它的理论原创性和实践品格、它和中国共产党人“文化革命”理论之间深刻的精神联系,更因为它和后者深刻持久、绵亘至今的历史文化实践有着理论上的吻合,所以,用这样一个“理论核心”来探讨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文化活动,应该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

第一节 摇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

正如波寇克所言:“文化领导权(文化领导权)的概念在葛兰西的社会理论和哲学中是核心和最具原创性的思想^[5]”,对于葛兰西而言,它既是一个分析性的概念,也是无产阶级的革命策略。在葛兰西这里,文化领导权主要意味着意识形态的或者说“知识与道德的领导^[6]”,它是“关于无所不包、占主导地位的

意识形态的一种思想,其范围广及一切社会的社会、文化和经济层面^[10]。葛兰西运用文化领导权的概念,深刻分析了资产阶级革命的发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以及现代民族国家的统治方法。他认为,国家主要有“暴力的”和“同意的”两种统治方法;“暴力”的统治自然依靠国家的军事和警察力量的“镇压”手段,而“同意”的统治,则是靠“生产一种社会其他从属的和结盟的阶级与团体都接受的世界观、哲学和道德的看法”^[11],正是通过普通人民的“同意”,国家才能牢固确立它的“历史合法性”并且真正实现自己的伦理本质。葛兰西曾经指出:“国家的最重要的作用之一,是把广大居民群众提高到符合一定的文化和道德水平,即符合生产发展的需要从而符合宰制阶级的利益这个水平或标准这个范围而言,每个国家都是伦理的,起正面作用的学校和起负面作用的镇压性的教育作用的法庭,都是国家最重要的这类活动,可是实际上,许多其他所谓的私人的主动的行动和活动,也有助于达成相同的目的,这就构成了统治阶级政治和文化的文化领导权的机器了”^[12]。正是因为看到了文化领导权对于国家的重要意义,所以葛兰西才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提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与斗争以及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策略。

作为一种革命策略,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无产阶级在真正夺取国家政权之前,必须首先打破资产阶级已经建立的文化领导权,并且不断扩大无产阶级自身在“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阵地”,以最终建立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这一点,与那些“市民社会”远不发达的东方专制国家如俄罗斯相比,在“市民社会”相当发达的西方,尤为重要,它甚至是无产阶级最终夺取国家政权的必要条件。萨松(萨松译)说过:“葛兰西的全部著作都认为,只有一个阶级

在它夺取国家政权之前享有文化领导权,才有可能建立完全的国家^{〔1〕}。无产阶级在夺取国家政权、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之后,仍然应该不断行使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葛兰西认为:“一个社会集团在取得政府权力之前能够而且必须行使‘领导权’(这确实是取得这样一种权力的主要条件之一);以后当它行使权力时,它成了统治者,但即使它牢牢地掌握了权力,它仍然必须继续‘领导’,^{〔2〕}”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组织化力量,是其高度重视的无产阶级政党。这种组织化力量的现代性意义在于,它已经不是前现代国家统领一切的君主,而是社会的一个组织,一个复杂的要素,在它之中,一个已经被承认并且在某种程度上在行动中已经被确定下来的集体意志开始获得具体的形式。这个在历史发展中产生出来的组织就是政党,它是最初的细胞,其中集中了力图成为普遍的和总体的集体意志的一些萌芽^{〔3〕}。无产阶级政党在实现自己的文化领导权时,应该专注于建立和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的机器”,这一点,不仅包括了阿尔都塞后来所说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也包括葛兰西所说的“私人的主动的行动和活动”^{〔4〕}。葛兰西将“私人的主动的行动和活动”也视为“文化领导权的机器”,意味着无产阶级政党需要完成两方面的艰巨任务:一是它“需要改造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使之为自己的事业服务”^{〔5〕},作为一个领导阶级,它要“为‘从意识形态上’同化和征服传统知识分子而斗争,但是,这种同化和征服越快和越有效,这个集团在同时精心培育它的有组织的知识分子的工作中就越成功”^{〔6〕},作为文化创造主要力量的知识分子由“传统”形态向“有组织”形态“改造”的成功与否,将决定着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是否能够实现;二是它必须将自己的意志化为广大人民的普遍意志,只有这样,无产阶级的政治与文化的领导权才能获得广泛的“同意”与

支持,因此,通过主观革命以重造新人的任务,便成了无产阶级政党的重要使命。

第二节 摇文化领导权的现代性本质与基本形态

实际上,我们的上述分析已经表明,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有着明确的现代性内容,这一理论,不仅为其后的“文化研究”提供了一个极为有效的现代性阐释代码,也在其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和新“左派”以及社会主义国家那里演变成为一种现代性的意识形态。

我们强调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现代性本质,是要将其与传统国家的文化集权或文化专制作出明确区分。首先,传统国家的合法性来源于“神意”(君权神授)或“血统”(世袭制),而不是某种现代意识形态,国家所要获得的“同意”,在很大程度上并不需要来自于广大人民,因为“在传统国家里,占社会成员绝大多数的下层成员主要由政治观念狭窄的村民和部落民组成。他们固定于传统生活方式,对他们经验所及的村落和部落内的政治事务可能会有积极的认知和参与,但是对于社会层次和国家层次的政治往往表现出陌生感。他们在习惯力量的支配下被动消极地接受传统的政治秩序,除非阶级压迫超出了他们的生理所能承受的程度,才会官逼民反,以暴力干预政治^[150]。传统国家所创生的,也不是与其“偏狭、臣属型政治文化”相对应的现代国家的“参与型”政治文化;其次,传统国家的文化集权虽然在残酷性方面也许为现代国家所远为不及,但是,一方面,由于其粗陋低劣的政治制度化水平及政治参与和政治整合能力,使其文化集权的依托性力量(君主及其臣属、低级官吏)远没有现

代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所依托的庞大的现代官僚体系高效有力，另一方面，更由于传统国家的文化集权缺乏现代大众传播媒介的技术凭依，因此，它的文化集权在文化动员的能力、范围、效率和对整个社会的文化渗透与文化控制方面，都远远不及现代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应该将作为现代性现象的文化领导权与传统国家的“文化集权”进行严格的区分。

作为现代性现象的文化领导权，主要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二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作为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形式，资本主义国家无论是在早期，还是在现在的发达资本主义时代，均都存在着进行文化领导的内在愿望与统治实践，这在“法国大革命”时期和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代，有着相当突出的表现，而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导因于他对资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深刻考察。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的区别，并不在于是否实行统治阶级的文化领导权，而是在于这种领导权具体的“文化”（意识形态）内涵和领导实践的方法与策略的区别。

政党政治和自由民主制度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重要特点，资本主义的文化领导权，同样需要将处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政党的政党理念以及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灌输”给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广大民众，以使他们的统治获得后者的“同意”。对于这一点，波寇克曾经指出，通过有效实行自己的文化领导权，“资产阶级使本阶级的世界观获得了普遍性而成为一种‘常识’”（葛兰西译）并使被统治阶级不知不觉接受这种常识^{〔1〕}。英国政治学家拉尔夫·密里本德在他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国家》一书中，也曾借用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详细探讨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过程”，对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资产

阶级政党、政府机构、资本家实业集团、选举活动、商业广告、大众传播媒介和学校教育所实行的文化领导权策略进行了深刻剖析。在分析资本主义国家的“表达自由”时,密里本德指出:“无论怎样自由,这种声音即使是多样的和不协调的,它们都采取了适合于资本主义社会的语言”^{〔1〕}。应该说,密里本德建立在大量的实证材料基础上对资本主义文化领导权的分析与批判,确实表现出了非凡的理论洞见,但是,我们还应指出,虽然密里本德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表达自由”背后所隐藏的文化领导权本质,但他毕竟承认和“其他‘铁板一块’的制度相比,资本主义国家的表达工具通常并非为占统治地位的政权所垄断并充当它的工具”这样一个事实。波寇克在批判资本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同时,也肯定了它的“比较高度的那种文化和政治的开放、容忍与多元主义”^{〔2〕}。

现代西方的国家学说往往片面地将社会主义国家视为一种“左派”的极权主义国家,并将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作为这种国家的典型进行指责,我们暂且不论这些指责的基本立场,只是想对这些理论所指出的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基本特点进行介绍,相信读者定会作出自己的评判:首先,社会主义国家是“以政党的理念(平等的民主)来确立国家的合法性根据并营构政党化的科层制”^{〔3〕},它“是某一政党依持其政党理念的道义性而独统的国家政制”^{〔4〕},因此,社会主义国家便是以执政党的政党理念作为全能性的意识形态要求民众的服从,这正如海耶克所说的:“必须替人们选择好信仰并强加在他们身上”^{〔5〕};“这些信仰必须要成为他们的信仰,成为一套普遍被接受的信条,以便使个人尽可能自愿地依照计划者所要求的方式行动”^{〔6〕},个体的思想与言论必须限定于国家所允许的范围之内;其次,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实现,有赖于思想教育以及其他不同方式

的有效结合。就前者而言,一切大众传播媒介和学校、社团等其他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均为国家所有;一切宣传都为同一目标服务,所有宣传工具都被协调起来朝着一个方向影响个人,并造成了特有的全体人民的思想“一体化”,^[10]这样,国家对其民众的思想教育在特定的情况下极为有效。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文化领导权与国家暴力的结合,并不是像斯大林时期的社会主义那样所独有的现象,在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上,这种结合也不鲜见,典型的如美国的“麦卡锡主义”时代。社会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之所以更多地受到片面性的指责,除了是因为资产阶级政治家基于其阶级立场的夸大以外,主要还是因为,社会主义发展史上类似于斯大林一样的“恐怖统治”给人带来了更加强烈的印象。

第三节摇社会主义国家文化领导权的理论谱系

虽然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的文化领导权有着共同的现代性本质,但其直接的理论来源,却是革命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共产党宣言》等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切历史冲突”均会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为意识的矛盾和思想斗争的基本观点,并且在从政治斗争、经济斗争、军事斗争等方面全面阐述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基本理论的时候,指出了无产阶级进行思想文化斗争的重要性。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这种思想文化斗争,一方面表现为在政治层面上和作为“他者”的“非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表现为和无产阶级内部及作为个体的无产者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文化”的斗争,因此,他们指出,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质

不仅“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关系实行最彻底的决裂”^{〔1〕},而且“毫不奇怪,它在自己的发展进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2〕},无产阶级只有在革命中“抛掉自己身上的一切陈旧的肮脏东西,才能建立社会的新基础”^{〔3〕}。很显然,在马克思和恩格斯这里,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的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未来的“新社会”之间,建立了一种至关重要的“基础性”关系。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时代,无产阶级的斗争实践虽然曾经建立过一个短期的无产阶级政权,但并未建成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无产阶级国家,因此,对于无产阶级的思想文化和无产阶级国家之间的复杂关系,他们亦未及给予充分论证,也正因此,斯大林才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只是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而只有在列宁这里,在无产阶级真正建立了自己的国家之后,才能将这些基本要点“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斯大林说:“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把他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4〕}。作为一个严整的理论体系,文化领导权理论自然是其整个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十月革命之前,列宁便在理论和实践上十分重视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问题,强调要“对任何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局限性和狭隘性展开批判”^{〔5〕},不断从事着对非无产阶级思想的斗争。十月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和其他布尔什维克党领袖仍然强调要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在理论上,列宁认为:“苏维埃工农共和国的整个教育事业,无论一般的政治教育或专门的艺术教育,都必须贯彻无产阶级斗争的精

神^{〔獭〕}，共产党应该“领导”艺术的发展并且“去形成和决定它的结果^{〔獭〕}”。在实践上，他于 1928 年和 1929 年亲自领导了反对以“无产阶级文化派”为代表的极“左”文化思潮和其它各种资产阶级思潮的斗争，确立了思想文化领域的无产阶级领导权。

在布尔什维克党内部，其他政治领袖和理论家均都坚持无产阶级的文化领导权原则，如布哈林便认为，无产阶级“在文学和文化等领域中”有着“依靠自己的力量”去“争得社会领导的历史性权利^{〔獭〕}”。托洛斯基也认为，“在艺术方面，党不能，一天也不能采取自由政策和不过问政治的自由原理^{〔獭〕}”。因此，他提出了评价文化问题的“政治标准”和“文化标准”，并且肯定前者的优先性，他说，“我们的标准是政治的，命令的，不宽容的^{〔獭〕}，那些有害于革命的艺术作品；无论它在形式上的收获怎样伟大，革命都更无迟疑地去加以干涉^{〔獭〕}”。至于斯大林在 30 年代基于极度“左”倾的指导思想而对与当时的极“左”意识形态不合的所谓“异端”的清洗，则更是尽人皆知的了。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尽管苏联共产党的政治领袖和理论家在坚持社会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基本原则方面完全一致，但在如何实施领导的具体方针、步骤及政策方面，却有着一定差异，如布哈林就认为，无产阶级由于在旧的社会制度中被压迫和被剥削的政治、经济地位所造成的文化上的落后，使其在取得政权之后的一段时期之内，“尚未成熟到可以掌握文化领导权”，因此，它在这一时期，只能对文化采取“一般的领导”，而“不可能进行全面领导^{〔獭〕}”。托洛斯基也认为，“艺术领域不是要党去命令的领域。党能够而且必须去保护并且帮助艺术，但是党仅仅是间接地领导它^{〔獭〕}，对于文化领域的专门性的问题，如果党暂时还无法妥当解决的话，那就应该“忍耐而且从容地等待^{〔獭〕}”。